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史記》與詠史懷古詞曲

趙望秦 李雲飛 著

● 叢刊主編 張新科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史記》與詠史懷古詞曲

趙望秦 李雲飛 著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張新科 主編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圖書代號：WX19N1228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與詠史懷古詞曲 / 趙望秦, 李雲飛著. —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2019. 8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 張新科主編)

ISBN 978-7-5695-1019-5

I. ①史… II. ①趙… ②李… III. ①古典詩歌—
詩歌研究—中國 ②《史記》—研究 IV. ①I207.22 ②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163451 號

《史記》與詠史懷古詞曲

SHIJI YU YONGSHI HUAIGU CIQU

趙望秦 李雲飛 著

出版統籌 /	雷永利
責任編輯 /	馮新宏
責任校對 /	馮新宏 王 璐
出版發行 /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西安市長安南路 199 號 郵編 710062)
網 址 /	http://www.snupg.com
經 銷 /	新華書店
印 刷 /	西安日報社印務中心
開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張 /	14
字 數 /	240 千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7-5695-1019-5
定 價 /	68.00 圓

讀者購書、書店添貨或發現印刷裝訂問題,請與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聯繫調換。

電 話:(029)85303622(傳真); 85307826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
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世界一流學科建設』成果

總 序

我國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展現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歷史，它既是一部宏偉的史學巨著，也是具有不朽魅力的文學名著，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兩千多年來，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史記》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形成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就中國古代的《史記》文學研究而言，漢魏六朝時期就已經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話題，如《史記》敘事問題，司馬遷“愛奇”問題，《史記》、《漢書》比較問題，等等。此後，隨着史傳文學的獨立、唐宋古文運動的發展、明代復古文學的興起，以及宋代以來印刷技術的不斷提高、出版事業的逐漸繁榮等文化背景的變化，《史記》的文學地位不斷鞏固和加強，因而從文學角度研究所得之成果也日益豐富，直至清代，形成了《史記》文學研究的集大成期。在這一時段，產生了大量論著，對《史記》的文學價值進行多方面的探索。這種種研究，曾對建構《史記》的文學經典地位

起到了積極作用，而時至今日仍具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促進《史記》文學研究更深入發展所必需借鑒利用的參考典籍。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許多有價值的《史記》文學研究著作至今沒有得到整理和研究。為了進一步挖掘這些古代學人《史記》文學研究著作的價值，系統地認識《史記》文學研究史，有必要對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著進行重新整理。本叢刊在較全面調查文獻資料基礎上，選擇了十多種民國以前有關《史記》文學研究的重要典籍，加以校勘標點，整理成更便於閱讀和利用的新版本，目的在於為當代《史記》文學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依據。本叢刊選擇典籍的基本原則是：

（一）着眼於文學性的研究著作。《史記》首先是史學著作，因而在《史記》研究史上，有大量從史學角度研究《史記》的著作，尤其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著作，但由於不合本叢刊的整理宗旨，所以，一般不在收錄範圍內。儘管《史記》不是虛構的文學作品，畢竟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充分施展了文學才華。因此，我們在着重於文學的同時，對有些具有文史交融性的研究著作，從大文學觀念出發，也適當予以選用。

（二）避免重復性的整理工作。近年來，《史記》研究不斷深入，資料整理工作也取得了較大成績。一些《史記》文學研究的著作，已經被學人們整理並出版，如姚芻田《史記菁華錄》、牛運震《史記評注》、凌稚隆《史記纂》、湯諧《史記半解》、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儲欣《史記選》、李晚芳《讀史管見》、吳見思《史記論文》、李景星《史記評議》，等等。這些著作在《史記》文學研究方

面雖各有其獨特之處，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復整理，重復出版，本叢刊就不予收錄了。所以，我們經過認真甄別，選擇那些未曾整理及出版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進行點校整理。

(三)注重多樣性的學術視角。古代《史記》文學研究著作，與今天的學術專著有所不同，或評點，或概說，或隨筆，或雜記，或感想，形式多樣，角度多種，層次多面，雖在理論體系上不夠完整，但都能給讀者及學人以諸多的啟發和思考。本叢刊所輯選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有的是對《史記》精彩語句的分類選錄，有的是從文字辨識的方面對《史記》文學文本進行解讀，有的是以詩歌形式對《史記》的詠贊，有的是對《史記》讀後感的記錄，有的則是既有個人的批語圈點，又有對他人的評論輯錄，還有的是對《史記》、《漢書》語言異同、敘寫優劣的比較。這些典籍，從宋代到近代，各有特色，對於認識《史記》的文學價值頗有意義，也能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史記》的文學性問題。

本叢刊擬分多輯出版，其中既有原為單行本者，也有原非單行本，而是由原書中抽出獨立成卷的涉及《史記》部分者。本叢刊所收的經過整理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的新版本，在整理體例上有着原則性的統一安排，如擇用善本，忠實底本，校勘謹嚴，標點規範等。在此前提下，對於具體負責各書整理工作的整理者及審定者則採取充分尊重其學術特長的態度，不做整齊劃一的硬性要求，可以自由地處理在整理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細節問題。為了幫助讀者能夠較好地了解原著的思想和意義，每種書前都有“整理弁言”或“前言”對其文學性特點和文獻學價值進行介紹分析。

本叢刊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得到陝西師範大學社科處的大力支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對本叢刊的出版也給予了多方面的幫助，我們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張新科

2015年8月10日

《史記》與詠史(代前言)

詠史詩詞曲有兩種體式，即櫟括史傳、以史為詩(廣義的詩)的正體或云傳體，和感慨寄興、以史詠懷的變體或云論體。詠史詩詞曲是融文學與史學特質於一體的重要韻語體式，其創作的素材，立足於歷史人物與事件。《史記》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又是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經典作品，自然成為詠史詩詞曲創作取材的淵藪。《史記》所成功塑造的大批人物形象，也自然成為了歷代詩詞曲作者或直接或間接的吟詠對象，由此而產生的詠史詩詞曲作品即是他們接受《史記》的結晶。這些作品既是反映《史記》對後世文學影響的有力證明，同時也是詠史詩詞曲中特殊的一類，對《史記》和詠史創作的關係有着不容忽視的研究價值。

本文依據《史記》與各個時期詠史創作的具體發展進程加以探究，梳理古代詩詞曲作者對《史記》的接受歷程，以期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史記》與詠史創作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在文學史、史學史上的價值。作為廣大受眾群體中的一個特殊的接受群體的詩詞曲作者，在文化修養、審美情趣、期待視野等方面和一般

的接受者有所不同，其在接受和傳播《史記》之時，既能使文本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得到不同形式上的豐富、完善，還能由此衍生、創作出更多的新作品，《史記》也因此被不斷地賦予新的內涵與意義。詩詞曲作者接受《史記》的創作成果，反過來又已成為《史記》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而使《史記》成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經典。

融合文、史於一身的《史記》，其文學成就自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以來，久已得到世人的認同。司馬遷以其非凡的文學才華和史學功夫，用如椽之筆，真實的再現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塑造出眾多感人肺腑的藝術形象。《史記》所具有的濃厚詩性，加上故事情節、人物形象而形成的母題和原型，因而成為歷代詠史創作的取材淵藪。由於時代背景和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時代的詩詞曲作者就有不同的審美情趣、鑒賞能力、期待視野、創作方式，其接受與影響在各個時期也就會隨之出現不同的特點。自東漢班固取材於《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而創作《詠史》一詩之後，詠史創作者們對《史記》的接受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兩宋、遼、金、元、明、清，或專詠一人一事，或合詠數人數事，不斷地與司馬遷產生着共鳴。其中，有和司馬遷觀點一致者，有深化司馬遷觀點者，也有不贊成其觀點而另發高論者。後代詩詞曲作者對《史記》的接受不僅表現在對《史記》本文的接受這一個方面，還表現在對其接受成果的再接受方面，使得接受之鏈不斷地豐富着、發展着，這既反映了詩詞曲作者對《史記》的認識和接受的基本態度，同時也折射出了時代審美和時代風尚，對於更好地挖掘《史記》及其詠史作品的文化內涵有着重大

的意義。

《史記》一書早在司馬遷生前即以單篇的形式流傳於長安城內外，而全本至宣帝時已公諸於世，迄于唐五代，產生了一批形式多樣、內容各異的整理型和研究型的《史記》文獻，僅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這三種史志目錄所著錄者進行統計，就有二十五種。班固直接取材於《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之“緹縈救父”史事而創作的《詠史》一詩，不僅在詠史創作史上，而且在古典詩歌史乃至文學史上都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而在《史記》接受史上的地位則更為突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蒼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瑩瑩。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①全詩以鋪陳史事為主，先敘寫緹縈救父的起因，即太倉公因罪被押送長安，緹縈有感於父親所說的話，一路跟隨到長安，上書請旨，願以己身代父，再敘文帝感其既勇又孝，為之廢除肉刑，結句發感慨，頌揚緹縈出于至情至性的救父之舉是遠勝男兒的。班固將司馬遷用二百字敘述的事件始末，用五言詩的形式簡縮為八十字，不但叙寫出全部史實，且於結尾處抒發感慨。雖以敘事為主，但也有感情寄託。班固晚年因不肖子而下獄，心中難免生出悲涼之感，便借緹縈之事屈折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無奈與悲哀。歷代皆認為此詩是開正體詠史之先河，却因鋪陳敘述，櫟括史事，被譏為“質木無文”。然總觀全詩，可以看出班固在詩

^① 逯欽立輯校《漢詩》卷五，《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170頁。

中表達出和司馬遷一致的情感傾向，即對殘酷刑法的不滿和對至孝之人的讚賞，同時也接受了《史記》的“寓論斷於序事”的敘事方式和直筆“實錄”的著史精神。

魏晉時期，天下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獨尊儒術”的局面被打破，而呈現的是玄學、佛教、道教和儒學並存的多元的文化社會，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與此相應的這一時期詠史創作漸趨成熟，而《史記》的傳播形式和途徑也大為改觀，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被廣大的詩人和學者所接受。《史記》所載各式人物、各種事件成為詠史創作原型的素材庫，寫出許多的以《史記》為內容的詠史詩，如左思《詠史》、張正見《韓信》和虞羲《詠霍將軍北伐》等。其中，左思《詠史》八首雖不全是吟詠《史記》中的人事，但在內容及情感兩個方面受《史記》的影響都很突出，吟詠對象多為《史記》所描摹的人物，或專詠一人，或合詠數人。左思就是通過所吟詠的人物如馮唐、主父偃、司馬相如等，將敘事、議論和抒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抒發個人處在門閥森嚴時代而使其才華不能得到施展的痛苦和憤懣。此組詩在詠史創作史乃至文學史上，和班固的《詠史》有着同樣重要的意義，開創了“名為詠史，實為詠懷”的變體也就是論體一脈，詠史創作的兩種主要體式自此而正式確立。

陶淵明更是此時期接受《史記》的典型，他的《讀史述九章》標明是讀《史記》有感而作的：“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①《史記》中眾多人物的不同遭遇，深深地影響和感染着陶淵明，於是採用四言詩的形式，或專詠一人，如箕子的亡國悲愴，韓非子的以文

①（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卷第六，512頁。

召禍；或合詠二人，如伯夷、叔齊的堅貞，管仲、鮑叔的相知，程嬰、公孫杵臼的仗義，屈原、賈誼的正直，魯國二儒的耿介；亦或泛詠多人，如孔子的七十二弟子等。其中都寄寓着陶淵明個人的思想意識。

自東漢末年到魏晉時期，詩人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關注個體生命的存在，重視自我的價值。所以，忠臣勇士便成了詠史創作的首選主題，如三良、藺相如、荊軻等，重點在於抒發個人對歷史的反思，從中生發出對現實的感慨。試舉荊軻為例，代表作有阮瑀《詠史詩(其二)》、王粲《荊軻為燕使》、左思《詠史詩(其六)》和陶淵明《詠荊軻》等。在眾多的紀傳體史籍人物中，司馬遷筆下的荊軻形象最為鮮明生動，最具感染力。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司馬遷眼裡，荊軻既是勇士、俠士，又是義士、烈士，理應“名垂後世”，同時也借他人之口對其最終刺殺秦王失敗表示惋惜。這四首詩從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了一個俠肝義膽的悲劇英雄形象，這與司馬遷的思想、情感傾向是一致的。左思《詠史(其六)》一詩避開燕太子丹如何禮遇荊軻，或荊軻刺秦王等人們熟知之事，而從細節寫起：“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①他和司馬遷一樣，極為讚賞有真性情之人。“士為知己者死”是左思也是司馬遷做人的準則。陶淵明《詠荊軻》則詳盡地敘述了荊軻刺秦王事件的始末，對其視死如歸的豪俠之氣給予高度贊揚。

南北朝時期，統治者更加看重以史為鑒的治國思想，史學和

^① 逯欽立輯校《晉詩》卷七，《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733頁。

史書受到進一步的重視，使《史記》的傳播普遍化，幾乎成為文人們的案頭讀物。詩人對《史記》的接受也因現實社會的政治、思想、學術等的影響，與漢魏兩晉相比，呈現出新的特點。南北朝時期政權更替極為頻繁，南方自視為正統的那些王朝和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那些政權始終難以打破對峙的格局，長年的戰亂使詩人渴望明君賢相再現世，以拯救世人於痛苦之中。同時，詩人也期望征戰殺敵，建立功業，以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與此相應的詩史創作也有了較大較快的發展。據統計，南北朝時期創作詠史詩的詩人及其作品的數量分別約為五十六人、一百一十六題一百三十九首。其中，以描寫《史記》內容為主要的作品有三十六首，約占這一時期詠史作品總數的26%。而且，吟詠漢代人事的較之前代明顯增多。漢高祖劉邦是《史記》中生動而豐滿的人物形象之一。而從《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留侯世家》《呂太后本紀》《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等相關記載中可以看出劉邦性格的多面性，既有雄才大略、知人善用、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殺戮功臣、好色自私的一面，甚至有些言行堪稱流氓、無賴。范泰《經漢高廟詩》：“嘯吒英豪萃，指揮五岳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瞳豈不偉，奮臂騰群雄。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①開頭四句先從正面描摹劉邦的雄才大略，然後又用一代霸主項羽的失敗，即“恃勇”是不順應“道”的行為，必然失敗，以襯托劉邦因順“道”而行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徐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是與梁簡文帝蕭綱的唱

^① 逯欽立輯校《宋詩》卷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1143頁。

和之作,吟詠劉邦的人生,但均為簡單敘說,未過多摻雜自我情感和主體意識,同後來眾多的或探究其奪取天下之原因、或批判其誅殺功臣之殘暴、或嘲諷其虛偽狡詐之行徑的詩作相比較而言,可以說是對《史記》中劉邦這一人物的認識尚處在初淺階段,稍顯蒼白。

《史記》所記敘的一系列漢朝文臣武將,如張良、韓信、霍去病等則成為南北朝時期詠史創作的取材源頭。南北分裂,連年混戰,社會動盪,人心惶惶,而有志之士希望能建立功業,平定天下,留名青史,使自己這個個體的生活也能既有社會價值又有人生意義。所以,他們的筆下常出現西漢文臣武將的身影,其中“王者師”的張良和“匈奴未滅,何以為家”的霍去病就成為吟詠的重點人物。謝瞻《經張子房廟》、鄭鮮之《行經張子房廟》和謝靈運“韓亡子房奮”詩,跨越歷史,懷念前賢,對張良輔佐劉邦成就大漢基業予以頌揚。此時期選官任職依然沿襲魏晉的門閥制度,世族勢力還很龐大,寒門士子除了建立軍功,似乎再無出路。所以,征戰沙場、屢立戰功而取得高官厚祿的霍去病成為了他們的偶像。霍去病是西漢傑出的青年將領,在抗擊匈奴的戰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漢武帝賞識,封為冠軍侯。南北朝時期吟詠霍去病的詩作主要描寫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氣勢,以期盼時代英雄的再次出現。如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旂。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讐,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

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①先描摹霍去病驅馬帶兵前往塞外的陣容，再渲染戰場地勢之險、戰事之急，又寫指揮若定，迅猛反擊，最後描述勝利凱旋、班師回朝。從出征到回師，從戰場到佈陣，從將軍到士兵，從前方到後方，僅用一首詩便能淋漓盡致地再現《史記》記載的這場重大戰役的全貌。全詩在綺麗纖細的風格中，却洋溢着雄壯慷慨的氣息。而在漢人創作的《琴曲歌辭》中，有一首傳為霍去病自作的《霍將軍歌》高唱道：“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皇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②主旨雖是歌頌霍去病所立赫赫戰功給大漢王朝帶來的和平安康，反映的却是穿越歷史時空而至南北朝時人們的心聲。

此外，南北朝詩人對漢代之前的聖君名相賢人忠臣，如夏禹、伍子胥、孟嘗君、魯仲連等也多有吟詠，這同樣也是出於對時代英雄再世的一種急切呼喚和熱切期盼。

有隋一代只有三十八年的歷史，朝代短暫，詩歌數量總體較少，而取材於《史記》的詠史創作也相應較少，僅有盧思道《春夕經行留侯墓詩》、楊素《行經漢高陵詩》（殘存兩句）和劉斌《和謁孔子廟》三首，然在詩人接受《史記》史上却有着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隋文帝楊堅統一全國（589年），結束了西晉滅亡（316年）以來近三百年南北對峙的歷史局面。此時的詩人多來自北齊、北周及梁、陳的文士，大都具有較好的文化素養，隋文帝、隋煬帝將其

① 逯欽立輯校《梁詩》卷五，《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1607頁。

② 逯欽立輯校《漢詩》卷一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315頁。

收納而為己用,促進了南北思想、文化的進一步融合。就接受《史記》而言,隋朝詩人評價張良的論調主要還是贊其智謀之多、頌其佐漢之功。但也偶有異調,如盧思道《春夕經行留侯墓詩》:“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①對於一生好老莊的張良來說,理應是羽化登仙,却最終為“掩高封”,從而發出了疑問。

至唐代,隨着詠史創作的發展進入成熟繁榮期,詩人對《史記》的接受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司馬遷的精神得以更深刻的表現。此時期取材於《史記》的詠史作品,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超前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與當時統治者對《史記》的高度重視,以及《史記》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唐代詩人的審美情趣、鑒賞能力、期待視野、創作方式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同時,有唐一代詩歌創作的繁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詠史這一詩歌體類的進一步發展。

重史崇史是古代文化的突出特點,歷代的統治者大多被重視史書的整理、編纂工作,唐代的統治者更是重視史書的教化垂鑒功能,大力主導史書的修撰,在唐太宗和許多重臣如房玄齡、魏徵、長孫無忌、褚遂良人等的共同努力下,在短時間內即編寫出後來列入“二十四史”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晉書》等八部紀傳體史書。隨着史學地位的提高,《史記》確立為正史之首,其傳播與研究的力度大幅提升,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性也愈加凸顯。早在唐太宗貞觀元年(627),朝廷

^① 盧思道著,祝尚書校注《盧思道集校注》,66頁。